

论清初南北汉官文化心态的差异

刘丽¹

(海南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58)

【摘要】: 明清鼎革之际, 相当一部分前明官员选择了与清廷合作, 成为清初政权运作中的重要力量。这部分汉官在清初又分化为南北两大汉官群体。由于地域文化、人文传统的差异, 清初南北汉官表现出了不同的文化心态, 而在他们诗文中则具体地体现为民族感情的差异。

【关键词】: 清初 汉官 民族感情 差异

【中图分类号】 I2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17)04-0044-06

我国幅员辽阔, 地域宽广,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各地因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不同的地域文化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简而言之, 我国地域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南北文化的差异: 一般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区称为北方文化区, 它主要包括燕赵地区、秦晋地区、齐鲁地区、中州地区; 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地区为南方文化区, 它主要包括两淮地区、吴越地区、江西地区。

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早已客观存在并为人们所注意。早在春秋时代, 就已有所谓的“南风”“北风”之别。据《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 “晋人闻有楚师, 师旷曰: ‘不害。吾骤歌北风, 又歌南风, 南风不竞, 多死声。楚必无功。’”^[1] 南方楚国的乐歌被称为“南风”, 北方的乐歌则被称为“北风”, 虽然师旷没有具体指出两者艺术风格上的差异, 与宏观视野中的文化概念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但是已有了明确的地域属性的意识。近人刘师培有《南北文学不同论》一文, 把这种南北性格的差异归结为地理环境的差异: “北方之地, 土厚水深, 民生其间, 多尚实际; 南方之地, 水势浩洋, 民生其际, 多尚虚无。”^[2] 至明清之际, 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进一步彰显。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风起云涌, 南方有“竟陵派”“公安派”“云间派”“虞山派”“娄东派”, 北方有“河朔派”“孟津派”等, 无不彰显着浓郁的地域色彩。至清初, 由于共同所遭遇的山河易主的大变局, 南北地域文学的差异有所淡化, 但南北文人、包括入仕清廷的南北汉官群体文化心态却仍呈现巨大的差异。南方汉官群体以陈名夏、陈之遴为首, 成员包括龚鼎孳、曹溶、熊文举、周亮工(周亮工虽占籍河南开封, 但生长于南京, 晚年在南京生活, 其思想与交游也多倾向南方文人, 故视为南人)、李元鼎等人。北方汉官群体以刘正宗为首, 群体成员包括王崇简、白胤谦、李呈祥、梁清标、胡世安、高珩等人。

这两个群体处于相同的时代, 具有相同的政治身份——贰臣, 也具有相同的文化身份——诗人, 但他们的处世态度、人格气质、创作追求却不尽相同。毋庸置疑, 这两大群体的贰臣诗人的内部联系是比较紧密的, 相近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文化背景以及社会网络, 使得他们内部不仅在政治上关系密切, 同道相谋, 在文学创作上也是同气相求, 颇多唱和, 形成了所谓“南北各亲其亲, 各友其友”的局面, 这中间固然有政治或利益的关系, 但更多的还是“嘤其鸣矣, 求其友声”的成分在里面。

南北贰臣诗人虽都同居于北京外城, 都喜吟诗论文、交游高会, 但以刘正宗为代表的北方贰臣诗人群体与陈名夏为代表的南方贰臣诗人群体之间的来往是很有限的, 他们是“道不同不相与谋”。这个“道不同”主要表现为民族感情的差异, 具体表现为两点: 一是对故国的感情差异; 二是对故君的感情差异。章太炎曾对钱谦益与冯铨作过比较: “谦益与冯铨, 其贰心一也, 一思明一

¹**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易代视域下的清初叙事诗研究”(项目编号: 14XZW016)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刘丽, 女, 辽宁本溪人, 海南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志明，则恶名归之于思明者。”（章太炎《诂书·别录甲》）。太炎先生的这番话，深刻指出了他们各自代表的南北汉官的思想倾向，即南方汉官民族感较强，北方汉官民族感较弱，这种倾向在他们的诗作中也都得到了鲜明的表现，下面略举他们诗歌中的金陵诗与扬州诗为证。

一、对故国的感情差异——以金陵、扬州为例

“金陵”在明代称为“南直隶”，这一称呼，表明了它在明代特殊的政治地位。而“金陵”在清初有着更复杂的意义，它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中包含了太多的内涵，其中既有政治的，也有文化的。金陵是明代全盛时期的象征，是明的开国之地，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寝孝陵就位于金陵钟山；此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即金陵也是南明弘光政权灭亡之地，所谓明朝成败均在金陵。当崇祯吊死煤山后，北京的明朝政权宣告灭亡，在南京陪都的官员拥立崇祯的堂兄朱由崧即位，国号为“弘光”。

弘光在金陵即位之初，曾经一度给国人带来中兴的希望。钱谦益在《甲申端阳感怀》诗中就用充满欣喜的笔调写道：“喜见陪京宫阙开，双悬日月照蓬莱。汉家光武天潢近，江左夷吾命世才。地自龙兴留胜概，人乘虎变勒云台。王师指日梟凶逆，露布高标慰九垓。”但遗憾的是，由于君昏臣暗，这个政权仅仅存在一年就被清军消灭了，成了昙花一现的短命王朝。弘光朝的灭亡，金陵的陷落，不仅象征着南明王朝的灭亡，相对于落后异族的统治而言，它还标志着中原文化的沦丧与士人精神支柱的彻底毁灭，标志着被驱除的鞑虏重新又占有中华，它严重打击了人们复明的信心。因此，在明清易代这个特殊的语境之中，金陵已非一个只具表层意义的城市名字。在具有故国情怀的士人那里，金陵每每让他们想到今日的繁荣昌盛与今日国破家亡，所以，他们来到金陵都有兴亡沧桑之叹。金陵已被升华成为一种情感色彩极浓的人文理想，甚至赋予生命的意义，已成为故国之痛的一个精神符号和象征。

清初之际文人在金陵的游观玩赏，亦与他地不同，他们很容易和政治兴亡联系起来，并且通过对金陵往事的追忆，对遗迹的凭吊，以寄寓亡国的哀思；尤其是出身南方的贰臣诗人，他们到此多感慨万端，提笔赋诗，大都有一层凄楚在字里行间。南方贰臣诗人中以金陵诗著名的是龚鼎孳，他的《上巳已过金陵》诗在当时就被广为传诵。其诗如下：

倚槛春愁玉树飘，空江铁锁野烟消。

兴怀何限兰亭感，流水青山送六朝。

诗中用典是龚鼎孳的强项，在这首短短的七绝中，他居然用了3个与金陵有关的典故，其中蕴含着作者复杂的感情。“上巳”即是阴历三月上旬的第1个巳日（魏晋后固定为三月初三），旧俗此日在水边洗濯污垢，祭祀祖先。此诗第1句用的是陈后主之典。陈后主建都金陵，溺于声色，曾作舞曲《玉树后庭花》，辞曰：“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后国破，时人以为谶语，实指弘光君臣的荒淫享乐而致亡国。第2句用的是西晋灭吴之典。据《晋书·王濬传》记载，晋太康元年正月，晋武帝司马炎命大将王濬率水师伐吴。吴帝孙皓令将士用铁链横锁江面，以阻拦晋军船只。王濬用火炬烧毁了铁锁，一举攻克金陵遂灭吴；这里实指清军渡江，金陵沦陷之事。第3句用的是王羲之与好友孙绰、谢安等人于兰亭雅集之事。其中“兰亭感”一句尤为值得玩味。最后一句“流水青山送六朝”。流水青山依旧，岁月送走了曾在金陵建都的6个王朝，也送走了南明的小朝廷，此句话是明伤六朝，暗伤南明。

龚鼎孳的这首诗写于他被派往广东宣诏返回京师的途中，其时作者因在执法中偏袒汉人而触怒满清权贵，遭贬官八级，故此时他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龚鼎孳过金陵，想到的事情可能很多，一句“兰亭感”道出作者无限复杂的情怀。“兰亭感”中蕴藏着的不仅是情事、雅集事，还有国事！在这里，他和倾心已久的名妓顾媚订情；在这里，他与当日复社友人谈论文，而今金陵如旧，人事全非。明清易代后，当日的复社好友阎尔梅等成为抗清志士，好友余怀以选择遗民终生，昔日的欢会已风消云散，今日的自己已成为大节有亏的贰臣。想到此，怎不百感丛生呢！

如果说这一首诗的家国身世之感写得还较为含蓄朦胧，是“才子语”（王士禛语），那么，龚鼎孳在其另一组诗《长干秋兴》则把这种亡国之恨表达得较为直露。其序中云：“是日，同友沂出南郊，坐雨花台，慨然有感。”那么，这种感觉是什么呢？接着作者

自己作了回答：“诸君南渡日，醉梦已封侯。”诗中感叹的是南明君臣的耽于享乐，导致亡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已昭然若揭。

南方贰臣诗人到金陵大多有诗，诗中又多表现对南明亡国的叹惋及对弘光君臣误国的谴责。熊文举《金陵怀古》其一：“燕云万色忆凄其，尚是君臣宴乐时。淮水不闻嘶战马，石城先已树降旗。潮回野岸家何在，人去空江事可悲。正是枫林凋落叶，栖鸦宁有上林枝。”^[1]南明君臣，拥有江南沃野千里，军队近百万，但弘光小朝廷的醉生梦死，连划江而治的南宋都比不上，如今国破家亡，连上林苑的鸦鹊都没有栖息之处了，是何等令人沉痛啊！熊文举又有《冬日过金陵有感》：“如此江山倍怆神，风光一隙堕泥尘。不闻尝胆求佳士，唯见倾心近佞臣。万骑晓嘶无战壁，孤帆宵度有俘臣。空留故垒寒芦在，明月萧萧一问津。”^[2]此诗指责弘光重用马士英、阮大铖等奸臣，导致南明政权的土崩瓦解。龚鼎孳在《纪伯紫金陵故宫诗跋》一语中更是直接点出马士英的名字：“钟山一老，徘徊吟眺，麦秀之感，苞桑之惕，凛乎有余恫焉！其曰自贵阳相……痛哉！小人之祸人国也，岂待铁锁沉江、三阁飞灰之日乎？”^[3]“贵阳相”就是马士英，真是古来小人祸人之国，莫过于马氏。

曹溶也有《金陵怀古》系列诗作，大意不出龚、熊等人。由此可见，龚鼎孳、熊文举等南方贰臣诗人，虽仕清廷，实愤明事。“金陵”之所以成为当时南方贰臣诗人及遗民诗人笔下常出现的意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亡国前后南京城市繁荣与衰败的强烈反差。遗民蒋超的《金陵旧院》一诗在当时之所以颇负盛名，就是如实地描述了这种反差：“锦袖歌残翠黛尘，楼台塌尽曲池湮。荒园一种瓢儿菜，独占秦淮旧院春。”此诗说尽了南京在明清易代后的荒芜萧条。经过清初战乱，南京人口骤减，又经过满洲八旗铁骑的践踏，南京受到极大破坏，城市文明经受着侵略与掠夺。此外，针对亡国后衣冠尽改、礼乐尽丧的文化荒凉，不止是遗民们，就是一些贰臣在心头也常常涌起对故国文化深切的依恋和怀念，金陵沧海桑田的变化在他们心头留下永难磨灭的创伤；借助金陵故实与场景表达黍离麦秀之感的作品，在南方贰臣诗人创作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梁清标也曾多次游历南京，写有多首诗作，但都是单纯的模山范水之作，无丝毫家国感触在里面。让我们看一下他游钟山后所写《孝陵林下偶成次沚亭相国韵》诗4首：

帐外粼粼碧涧流，孤峰斜日照山楼。

征尘暂息翻忘暑，万壑风来六月秋。

当风布席晚霞天，坐久中林望夕烟。

初月一钩生木末，星河影落酒樽前。

连冈张幄傍林居，好鸟相呼欹枕余。

扰扰古今真梦幻，临风欲废一编书。

轻阴深树日从容，无事高眠对远峰。

谷口朝来多紫气，苍茫遥指孝陵松。

孝陵为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寝陵，对于故明翰林院庶吉士的梁清标来说，到这里应该多少是有些感慨的，但这4首诗却一概写得风华清靡，无半点感情的激荡。梁氏笔下的孝陵只见流水潺潺，凉风习习，再加星河月落，紫气蒸腾，全是一片云里雾里，要不是题目与后一句点明是在孝陵下所写，怎么看都是一个普通的风景点。面对先朝开国皇帝的陵墓，居然无一丝故国沧桑之感，真是诗中“无我”到极点了。梁清标还有描写金陵的若干首诗，大抵不出以上情致。李呈祥也曾数至金陵，集中有《十七日同苏竹浦暨

张孺野季修兄弟登长干宝塔》《五日至金陵晤刘大祈同门感赋》等,都不出描山画水的范围。高珩在金陵留下的也多是此类诗作,不是看花,就是观草。现举其一《忆白下竹》诗,可窥其金陵诗之全豹一斑:“傍寺临溪万玉繁,插天青凤羽翰尊。愿随蓟州分身去,有竹人家遍叩门。”^[4]看来白下之竹与其他地方的竹子也没什么两样,不像南方贰臣诗人,金陵(白下)的一草一木都能引起他们的感触万千。与梁清标相似,金陵在高珩的心中也不激起什么特殊的情感,他眼中的金陵就是金陵,山河如旧,如他自言“常以琴樽游物外,懒将冰炭到胸中”。有琴有酒万事足,管他沧海桑田的世事如何。

在明清之际比较敏感的城市除金陵外,还有扬州。顺治二年乙酉(1645年),清军为惩罚扬州军民的拼死抵抗,在攻陷扬州城后,纵兵抢劫,屠城十日,约80万人惨遭杀害,史称“扬州十日”。这使扬州城遭到了致命打击,残砖破瓦,几无孑遗,昔日的繁荣顷刻尽失。屠城留下的痕迹,足以让每一个身临扬州的人,尤其是汉人痛心疾首。而高珩集中过扬州所写之诗,与对金陵的态度一样,都没有任何的沧桑色彩,不过相比金陵看竹,倒是历史色彩略为丰富。如《扬州》诗:“殿脚垂杨夹岸栽,杨家天子旧多才。墓田合傍山岗好,直入雷塘特地来。”高珩过扬州没有想到“扬州十日”,没有想到史可法,而想到的是“多才”的杨广,虽说现实感不强,毕竟倒是多了些历史内涵;下面的这首《初春扬州》则完全是披风抹月:“风雨南塘暗,垂杨绿未匀。轻帆兰渚路,微雨杏花春。青眼逢人笑,苍头贯酒频。乞浆元有地,莫讶叩门人。”在明清易代之际,扬州所遭受的惨痛经历在高珩诗中看不到半点踪影,充盈其中的只有风花雪月。

李呈祥在过扬州时也写有《泊广陵》:“宵发高邮城,广陵日及午。出墙有杏花,夹岸多芳杜。寺宇围松杉,楼船震箫鼓。扼江一都会,渚海众商贾。岁月人事新,隍池地形古。舟行此暂停,安知非吾土。”^[5]高李之诗都把扬州写成清平胜地,用骀荡的春色掩盖了墓园和战痕,摆脱了惆怅的情调,描绘了一个赏心悦目的烟花扬州;将易代之际扬州血与火的往事消弭在自然景色之中,尤其是李呈祥“岁月人事新”更是没有一点故国之感,而是感到日新月异的欣喜。再看龚鼎孳过扬州所作的《广陵感旧》:“怀乡王粲几登楼,目断长河天外流。故国未归空有梦,深宫谁信竟无愁。将军自换麒麟阁,丞相能操舴艋舟。到日竹西歌吹改,烟花不分说扬州。”^[6]其迷茫、其惆怅,略加比较,我们就能读出其中的情感差异。

总之,北方贰臣诗人在金陵、扬州等政治上比较敏感的地方驻留,都少有兴亡沧桑之感。所写的诗歌几乎都是单纯的山水之作,不知是他们有意避免流露此种感情,还是根本就没有想到故国,或者说家国之痛对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人事都能淡然应对,更别谈山水自然了。

二、对故君的感情差异——以对崇祯的感情差异为例

南方贰臣除了具有浓厚的“故国情结”外,还有强烈的“故君情结”,即都对故君崇祯表现出深切的怀念之情。“故君”作为与新朝对立的意象和传统文化的载体,对故君的追思与怀念既表现了贰臣对失路之行为的深切忏悔,也表现了贰臣诗人与遗民共同的故国之思。因为在封建社会,君即是国。遗民思故国、故君自是情理中事,而贰臣思故国尚可,思故君并且明确地在诗文中表现出来,不能不说是冒着一定政治风险,需要一定的勇气的。在历史上,末代皇帝被称为亡国之君,大都遭世人唾骂,唯有崇祯帝是个例外,连李自成在《登极诏》中也说他“君非甚暗”。

当时人们对崇祯帝之难守宗庙较多地持宽容和谅解态度,而对弘光朝则殊多愤怨。时人说起崇祯帝,大都抱一种同情的态度,不乏赞誉之辞,这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反思明朝覆亡的原因时,当时大多数人,包括一些贰臣诗人都对先期殉国的崇祯表现出了同情与怀念,甚至不无溢美。熊文举《杂诗》可视为时人对崇祯的一种典型态度:“频开宣室召真儒,夜半披霜答谏书。十七年来辛苦尽,临春结绮等丘墟。”诗中把崇祯写成了爱才重士的汉文帝,又勤于政事,所谓“十七年来辛苦尽”,对崇祯充满了赞美之情。但事实上崇祯刚愎自用,自作英明,委过臣下,待大臣非常刻薄,一朝用了50相,但是他一死遮百丑。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殉国的壮烈行为,体现了君主的尊严和荣誉,在某种意义上说,有示范天下的意义。

3月19日是崇祯的忌日,这一天对遗民诗人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对南方贰臣诗人来说也是铭心刻骨的一天,他们泣血锥心的程度并不逊于遗民诗人,并且比起遗民自由自在的在野身份,南方贰臣诗人作为新朝高官,处于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这种

感情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如龚鼎孳《乙酉三月十九日述怀》就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写道：

残生犹得见花光，回首啼鹃血万行。

龙去苍梧仙驭杳，莺过堤柳暮云黄。

寝园麦饭虚寒食，风雨雕弓泣尚方。

愁绝茂陵春草碧，罪臣赋已罢长杨。

“乙酉”为顺治二年(1645年)，距崇祯京破殉国之日为一周年。诗中龚用“鹃血”、“残生”、“愁绝”等一系列感情色彩很强的词语表达了自己对崇祯的怀念。虽然崇祯驭臣严苛，龚鼎孳在李自成入京之时因言事得罪还被关在狱中，但龚鼎孳对故君还是毫无怨恨，充满真挚的思念之情与锥心涕血的深恸。李雯有曾和作《十九日集孝升斋和其原韵时同赋者朱邃初胡孝绪》：“残春回首见明光，饮泣东风又数行。国恨如新芳草碧，故人怀旧夕阳黄。花通鹤禁愁千绪，日冷松门天一方。谁抱衣冠游月窟，殷勤宫监说先皇。”^[7]可见，在座的南方贰臣诗人有着共同的故君情感。

被崇祯帝逐出京城，宣布永不叙用的陈之遴，竟也在其组诗《燕京杂诗》中对故君崇祯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与赞美：“烈皇亦是英明后，辛苦兴邦反丧邦。南渡有臣曾死谏，西征无将不生降。鹊枝血洒春宫六，龙驭魂归夜阙双。差幸孝陵弓剑地，寇氛犹自限长江。”^[8]陈之遴的儿女亲家吴伟业对崇祯的感情更深了，明亡后他曾参加了太仓遗民私祭思宗的仪式，这在当时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吴梅村在祭奠仪式上写有《新蒲绿》两首，感情极其沉痛：

白发禅僧到讲堂，衲衣锡杖拜先皇。

半杯松叶长陵饭，一柱沉香寝庙香。

有恨山川空岁改，无情莺燕又春忙。

欲知遗老伤心事，月下钟楼照万方。

甲申龙去可悲哉，几度春风长绿苔。

扰扰十年陵谷变，寥寥七日道场开。

剖肝义士沉沧海，尝胆王孙葬劫灰。

谁助老僧清夜哭，只应猿鹤与同哀。

吴梅村参加的这次故明遗民私祭思宗的仪式，是在顺治十年崇祯忌日，10年过去了，吴梅村心中的故君之思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薄。

北方贰臣诗人中，只有王崇简在顺治二年乙酉写有《三月十九日哭先皇帝》3首^[9]，王崇简在北方贰臣诗人中算是对故国故君较有情义之人，但要说明的是，他写此诗时尚未出仕清廷。王崇简是在顺治三年仕清的，此时还是平民，不需要担当什么风险，而龚鼎孳等人则已身仕清廷了，言行都处于统治者的视线之内，更要担当风险。两相比较，份量轻重可以想见。北方贰臣诗人，无论他

们遭际如何，作品中都很少流露出对旧国旧君的依恋怀念之情，相反他们对新朝新君却是赤诚一片。对新朝，他们有生得逢时之感；对新君，他们有鱼水遇合之情。因此他们的诗中虽然也有身世穷达之叹、年命流逝之悲，但在政治上与新朝的相处还是较为融洽的。如刘正宗《丙申生日二首》诗中所言：“十载长安陌，兹晨感兴同。萧疏添白发，淅沥领西风。宦久忘为客，年衰号为翁。难辞儿女意，拼醉博颜红。”^[10]一句“宦久忘为客”形象地点明了北方贰臣诗人对新朝的认同感。而李呈祥的《古意两首别梁玉立》则代表了北方贰臣诗人对新朝的感恩心态：“落叶岂无蒂，浮云亦有根。人生感离别，动如飞鸟翻。秋风吹明月，摇摇千里魂。洒泪向天地，深怀未抱恩。”^[11]是明朝给了他们科名荣耀，但他们所怀有的却是对清末报之恩，字里行间全是对新朝的感遇，而没有对前朝的丝毫眷恋，未免于人情说不过去。

下面，我们看一下梁清标所写的悼念顺治的系列诗作，就知道他们对新君是如何的情深意重了。顺治驾崩后，梁清标正在当值，闻讯即写有《辛丑元夕值先皇鼎湖之变斋宿署中》：

衙斋日暮澹飞尘，此际乌号饮恨新。

清吹不闻喧辇路，明灯相对泣孤臣。

团圞自度疏宜月，寂历谁怜上苑春。

犹忆去年酺赐夜，火山十里醉游人。

听到顺治去世消息，梁清标描写自己立刻就失声痛哭，其对顺治感情不可谓不深。再看他的《晓起入朝即事》诗，更是写得饱含哀情：“朝朝羸马哭先皇，一片鸦飞带晓霜。紫禁歌钟人寂寞，瞳眈日色满昭阳。”^[12]这首诗写得更是悲切动人！梁清标在每天上朝的路上，都不忘“哭先皇”，可见真正是人到“伤心处”了，并且还是骑着“羸马”，踏着秋霜，听着归鸦的叫声，真有马致远的“断肠人在天涯”的感觉。不过，这是“断肠人在朝廷”！只是惊诧于梁清标为何没有一篇诗文哭崇祯“先皇”呢？其《蕉林诗集》洋洋洒洒十八卷，无一语提及先君崇祯，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好歹也做过明朝的臣子。顺治驾崩后，他自称是清孤臣，那明亡时，他算什么呢？总之，凡是与先帝顺治有关的诗作，他总有“泪”字在里面。

梁清标还有《恭听先皇遗诏》诗，都表现了对顺治驾崩的悲痛之情，对比明显的是钱谦益在顺治崩后也写有《二月初四日夜宴述古堂酒罢》一诗，系为庆祝顺治死而作，其中有“而今建女无颜色，夺尽燕支插柰花”，其兴高采烈之语调几乎毫不掩饰。总之，大多数北方贰臣诗人抑或忘了故国故君，或者从来就没有想起过故国故君，南方贰臣诗人却是人在新朝，而情系故国。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左传》，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43页。

[2]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3] 《清世祖实录》卷九九，第3页，原为陈之遴引罪回奏论及当时政局之文字。

[4] (清) 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三十九《上巳将过金陵》，第227页。钟振振主编，陈敏杰点校《龚鼎孳诗》，《长干秋兴》，广陵书社，2003年版，

[5] (清) 梁清标：《蕉林诗集》七言绝句《孝陵林下偶成次沚亭相国韵》；七言绝句一《晓起入朝即事》，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康熙十七年梁允植刻本。

[6] (清)高珩:《栖云阁诗》,卷十二《忆白下竹》;卷十五《酷爱》;卷十二《初春扬州》。

[7] (清)李呈祥:《东村集》,卷四《泊广陵》,山西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仪一堂刻本;卷一《古意两首别梁玉立》。

[8] (清)熊文举:《雪堂先生集选》卷五下《诸公泣别》;卷四下《怀友》。

[9] (清)李雯:《蓼斋后集》,卷三《十九日集孝升斋和其原韵时同赋者朱邃初胡孝绪》其一,四库禁毁丛刊,北京出版社,顺治十四年年石维昆刻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10] (清)陈之遴:《浮云集》,卷七《燕京杂诗》其五,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旋吉堂刻本。

[11] (清)王崇简:《清箱堂诗集》,卷四《三月十九日哭先皇帝》。清顺治刻本,见《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

[12] (清)刘正宗:《逋斋诗》,癸巳卷《除日》,清顺治刻本,见《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